

珠三角地区娱乐行业女性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 和自我实践^①

丁瑜*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学界和大众文化普遍把贫困归结为女性流动和进入性产业的主要原因, 但笔者的田野研究发现, “贫困”描述的背后有丰富的内涵, 反映出这群女性对融入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分享国家快速发展的成果的渴求。但在现今法制环境、社会道德和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的约束下, 要真正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 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并非易事, 因此日常生活层面上的“微小抗争” (minor genres of resistance) 就成为了她们表达自我、性别身份和欲望的场所。

[关键词] 城乡流动; 娱乐行业/性产业; 现代化; 日常生活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1613 (2011) 05-0043-09

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与工业化进程, 城乡二元差距扩大, 人口流动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 引起了各界关注。流动和迁移在体制、文化、经济各方面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变迁下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国内外已有大量相关研究, 对人口迁移的原因、过程、结果、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流动人口中的性别差异, 就女性农民工就业、待遇、婚姻、家庭、消费、身份认同等议题进行了探讨。而本文将要探讨的人群——女性娱乐行业从业者, 也属于流动人口范畴, 她们的地域流动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但由于社会隔绝, 为了在城市中生存下去, 她们不得不开拓另一种途径。由于身份的特殊性, 她们的经验独具一格, 但学者对这一人群的流动却缺乏认识。

学术界目前对娱乐行业和性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成因、人员结构、产业结构、法制法规等宏观性议题上, 少有从从业者自身角度出发进行的叙述与呈现。另一方面, 针对从业者进行的学术讨论也主要是从道德批判、定罪执法、艾滋防治、公共健康、卫生防疫、社会心理、历史发展等角度进行,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的较为缺乏, 只有潘绥铭 (1997, 2000, 2005)、黄盈盈 (2003, 2004) 等少数学者进行过翔实的田野研究, 从她们的工作经历、职业化水平、健康、婚恋、权利等方面呈现给读者第一手的丰富资料。对于这个人群的“流动性”, 包括地域流动和行业流动, 现有讨论都聚焦在她们从其他行业转入娱乐行业或行间的职业变迁上 (黄盈盈, 2004; 张慧霞, 2005; 王昕, 2009),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流动经历——农村-城市的流动, 包括农村生活经历, 农村-城市流动的原因, 对城市生活的主体感受, 和流动对生活及观念产生的深层影响等则未作深入阐述。

本文将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结合在珠三角地区进行的田野调查, 本着主体建构的思想, 从微观角度探讨作为流动人口的女性娱乐行业从业者从农村到城市流动前后的生活经验。笔者将重

^①获中国第四十七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 (项目编号: 20100470965)。

* [收稿日期] 2011-07-23

[作者简介] 丁瑜 (1980-),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师资博士后、讲师。研究方向: 女性工作与日常生活, 女性流动人口, 女性社会工作等。

点阐述：1) 珠三角地区娱乐行业的女性从业者对农村生活的描述；2) 作为农村到城市流动人口，她们对城市生活的理解 and 需求；3) 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表达自己的需求，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笔者认为，她们在流动前的生活体验对流动本身，包括农村-城市迁移和职业流动的决策和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流动后的生活、工作经验又持续影响着社会资源的积累、运用和观念看法的形成，这些方面都应在研究中予以重视和体现。而作为三重污名下女性从业者，在身份制度缺失的环境下，她们把日常生活变成微小抗争的试验场，不断的进行着自我形塑，通过不同的城市生活表征来表达作为城市化、现代化主体的欲望。

一、一个新的视角：欲望主体与欲望解读

笔者在田野的实际接触中发现，珠三角地区的女性娱乐行业从业者就是劳动力大军中的一部分，是劳动力市场中典型的流动人口。她们中有的在进入这一行前从事过其他劳动，最常见的是保姆、销售、服务员，也有不少是直接进入的，即初次就业就是娱乐行业。社会学领域对职业流动有相当多的阐述（李若建，1995；李强，1999；孙琼如，2007）；关于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也得到了大量关注（王春光，2001；李强，2000；李春玲，2009a；任远，2010），在此不一一赘述。但目前这些论述所涉及的职业皆是主流文化接纳的职业，而娱乐行业和性产业属于灰色地带，没有合法的地位，由此带来的社会污名与从业者所得利益、经济效益和自我价值就有可能互相抑制的（张慧霞，2005：243-244）。这就与一般职业之社会声望与经济效益、自我实现感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同。

潘绥铭曾根据国内外文献梳理出10大类29种女性参与卖淫原因的观点理论（2005：292-308）。黄盈盈则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女性进入性产业是一种“得失平衡”，是一种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她可以选择牺牲个人声望、社会福利和部分权力，来换取“较高的收入、更轻的劳动强度和相对的自由”（黄盈盈，潘绥铭，2003：59）。张慧霞认为，应从性工作者自愿与否的角度来考察她们的流入，从“完全自愿”到“完全被迫”间可以划分为六个档次（2005：257）。完全自愿指的是与其他女性相比，从业者也有较多的就业选择，是因为“喜欢或乐意“去从事性工作的；而自愿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选择较小，只能在工厂工人与性产业间选择（2005：258）。这些研究首先详细的分析了各种流入途径与业内/业间流动状况，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性工作者的流动机制。同时它们也揭示了娱乐行业或性产业从业者流入情况的多元性，首次提出了小姐群体的自主性，回应了较早前关于此议题的道德批判和压迫论调。但有一个问题在现有的框架下却始终无法很好的回答，即这种“得失平衡”、“自身内部调整”与“自愿”、“喜欢”，到底来源于一种什么驱动力或动机？女性从业者从中到底得到了什么？目前的研究都基于“性工作”的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的框架下，即认为这是一种与其他职业相同的职业，应给予合法地位和承认从业者的合法身份（潘绥铭，2005；李银河，2005）。当学者和行动者为这群女性奔走呼号、要赋予她们“性工作”权利的时候，她们自己又是怎么想的呢？她们心中渴望的是这份“工作”吗？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经济驱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黄盈盈，潘绥铭，2003：58；Jacka，2006：123）。这在从业者本身的说法中也能得到印证。笔者所访问到的个案中，大部分都提到过因为“没钱”而进行。这其实也是在“笑贫不笑娼”的风气下一种挪用正当论述为自己正名的方式（何春蕤，2001）。但笔者发现，虽然总体上比之前有较大提高，她们目前从事这一行所得的收入却并不稳定，尤其是对那些位于性产业职业分层较下端的人来说，最近几年的严打更使她们遁入地下，靠积蓄生活。由于消费习惯偏于大手大脚，她们的积蓄也大多只有几千元，有些甚至常常要为下几顿发愁，似乎永远也实现不了“攒足了5万块我就收手不干”的愿望。笔者还留意到她们购物、

消费中的一些细节：她们往往很容易满足于一些微小的事物，例如使用某个品牌的卫生纸，到哪个商场去买东西，吃麦当劳或肯德基快餐、住进要交管理费的小区等等，她们觉得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形象”。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表面的东西于她们来说却是重要？如果说经济考虑是她们流动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些在无实质生活改善之下对生活细节的注重？

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需要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人群的流动与职业选择，从这样的职业本身出发去看从业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的细节往往能揭示出常人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世界中对行为的建构和理解，也能从这些主观意义（meaning）中了解他们的各种梦想、欲望、对未来的想象，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未必会带来实质的行动，但会对生活中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Mahler and Pessa, 2001: 447）。国内外一些学者也对女性生活中的欲望和情感力量进行过分析。

潘毅在她的著作中多次谈及欲望（潘毅，2003，2005）。潘毅认为，农村/城市日益加大的差距带来的虚空感放大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打工妹的消费欲望，促使她们走入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因此个人的欲望被解读为“所有一切现实和真理的源泉”（潘毅，2003: 482），它就像一架机器，与消费互相作用，使打工妹在欲望下消费，在消费中不断生产更多的欲望。消费被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运作，是国家在全球化中急于调整自己的位置时用以刺激经济的一种策略，而非草根自发的、出于个人意愿的行为。在这样的消费中，形成了新的不平等阶层。打工妹为了不被边缘化，只有不停地消费，想要变成模范消费者。潘毅（1999）运用了“微型抗争”（micro genre of resistance）的概念去解读打工妹在车间里的劳动生活：她们在那里发动别样的“社会革命”，对抗打工经历中的痛苦和悲伤。这不是一种集体抗争的形式，而是在阶层意识觉醒的每一个时刻所发挥出来的自主性。在她笔下，“欲望”产生于阶级意识的层面上，是一种自我教化（self technology）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打工妹的形象是悲情的——无论怎么消费，她们只能是低下阶层，横亘在她们和城市消费者之间的似乎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美国学者罗丽莎（Lisa Rofel）则认为欲望是一种“在不同的领域——情色、物质的和精神情感中——交织作用的期待、需要和渴望”^①（2007: 3）。通过欲望的概念，她把个人主体与中国“重归世界轨迹”的国家使命连结在一起，欲望主体（desiring subject）与欲望中国是互相构成的——在中国重归世界经济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重塑自己的主体；每个个人的自我表征（self representation）就构成了国家的文化想象（cultural imaginary）。如果说潘毅强调的是欲望背后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罗丽莎则更多地把欲望看成是一种向往新事物、新生活、新时代和一切新东西的人性，跨越阶级、性别、种族、年龄而存在，它跟国家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融合的关系（ibid.: 20, 21）。

她还提出，在不同社会空间、历史政治背景下现代化有着不同的定义，它从来就不是既定的事实，更非单一的概念（Rofel, 1999, 2001: 637），每个人或是每代人心目中对现代化、国际化都有不同的理解和想象。这就是欲望的实验性和不确定性，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个人的欲望在这种背景下也是没有定式的，每个人对改变有不同的解读，对新生活有不同的愿景。欲望因此有了颠覆传统和既定的性质和潜力（Rofel, 2007: 6, 23, 25）。在珠三角地区，绝大部分性产业女性从业者都是非广东户籍人口。她们就像我们熟悉的打工妹，缺少社会福利，没有社会地位，基本权益难以保障，还要忍受歧视、偏见与承受情感负担（李春玲，2009b: 30, 36；樊士德，2011: 40-41）。更甚的是，她们不仅背负着外来农村人口的污名和作为女性的弱势，还需承受行业污名。在这样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下，身份政治框架下的赋权只是一个美好但却艰难

^① 作者译。

的愿景。而如果我们用欲望概念解读性产业女性从业者这样的底层人群对生活经验的主体建构,我们就更能理解他们所作的生活选择,不会简单的就把他们的想法行为归结为不正当、越轨、失足或者堕落,也更能明白前文提出的那些“为什么”和更多的看似矛盾或者难以理解的问题,因此欲望话语(the language of desire)(曾家达,何式凝,2007)超越身份政治,更适于分析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

二、妇女流动与城乡流动的主体建构

笔者在进行深入访谈的时候发现,农村和小城镇生活在这群女性的心目中既是值得回忆的“单纯美好”,也是记忆深刻的“穷困艰难”。然而不同的人心中贫困的表征互异,关于贫困的叙述和强调点也不尽相同,笔者留意到在经济驱动一说的背后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探讨。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种说法。

(一) 辍学

笔者的调查对象里大多数人是初中或小学学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能否上得起学是衡量家里经济条件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上一辈人认为读书是改变生活命运的唯一出路,这群女性却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读书固然是寻求出路的一个办法,但投资时间长、收效不保证,实非易路。一部分女性在叙述辍学经历的时候强调的不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而是自己的意愿。“在村子里只要有点文化就够了,”“读到小学就挺好的了,能写写算算”,“很少人会上到初中”,初中学的“代数、英语没什么用”,因此感觉能出去打打工更实际,能用赚到的钱买点衣服,能使生活立刻产生一点实质性的变化。她们中有一些认为,自己“反正不会是一个好学生”,“老师提问我也不会答,考试分数也不高”,“还要花钱买课本”,既然“在这方面做不好”,还不如另找出路。读书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而已,不想呆在学校,也不想呆在农村,就可以选择到外面去打工。在叙述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埋怨或哀叹贫困的农村生活,而是强调了她们的自主性,她们对新生活方式和外面世界的向往,渴望从无味繁重的农村劳动中解脱出来。

教育作为社会流动,尤其是上升流动的主要动力,对农村-城市流动的人口有着重要影响,它如同一座桥梁架设在两个世界之间,一头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农村,一头连着文明、现代、快速发展的城市,只有通过这座桥梁才更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李春玲,2009b)。但农村教育资源有限,家庭贫困更加大了辍学的可能。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恰好了解到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做的一项对特困生的调查,按2004年农民年平均纯收入和一名贫困本科生一年所需的费用计算,本科四年的花费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家庭35年的纯收入^②。一个被访者说道,念书念得好最终能上大学或到城里工作的人在村里是没有的,听说过的也就一两个。教育投入与产出的不平衡往往使农村的孩子陷入无书可读,无钱可读的境地,多于一孩的家庭又往往牺牲女孩以求让男孩读书。因此通过教育改善生活的路子十分艰难,尤其对于女性来说,既不可得,也不好走。她们的“读书无用论”其实是对眼下这种情况的合理化和弱化处理,向城市流动,甚至进入娱乐行业、性产业都是自己的“自主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农村女性贫穷、弱势、被动、文化水平低、无技能的形象。

在城市里做保姆或在工厂打工固然是一种出路,可以保证稳定收入,但这与她们想象中的现代化生活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从老乡的反馈中她们还是能得到很多关于打工的信息。高劳动强度、低工资、缺乏回报,买不起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讨薪倒是家常便饭;呆在城市边缘的工厂区,

^② 具体报道见新华网财经频道《我国首次调查特困生 大学学费相当农民35年收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8/10/content_3334403.htm

在严苛的宿舍劳动体制下被全面控制与异化（任焰，潘毅，2006）；总是只能以打工妹自居，处在现代化边缘，无法实际体会改革带来的好处，无法逃离严海蓉笔下打工妹“属下阶层”的命运（2005）。若是到卡拉ok酒廊或夜总会工作，不仅收入会增多，居住条件改善，也能更靠近城市中心，整个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聚焦她们成为城市化、现代化主体的欲望，就会理解这对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流动人口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差的选择。

（二）趁年轻闯世界

在对第二代农民工流动的论述中，很多学者提出，与父辈相比，这群年轻人更注重的是自身的发展机会和眼界见识，并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有较强烈的要求，笔者的研究也显示出这群女性对青春的独到看法，以及这些叙述背后所隐藏的成为现代化城市化主体的欲望。在叙述贫困的时候她们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描述，而是强调年轻和出去的重要性。

在她们的叙述中，青春这个抽象概念被理解为“时尚潮流”（具体化为“漂亮衣裳”、“生日礼物”、“电子产品”、“摩托车”），“面对现实”（她们分别提到“看清农村与城市的差别”、“找机会出去”、“抓住时间与机会”、“抓住机会改变生活”、“没钱是最大的现实”），“敢于尝试”（指“出去看世界、尝试不同的生活”、“年轻就要动”、“想做OL”、“内心不安分”）。而生活“又简单，又没什么事干，又穷”的农村不是实现这些想法的地方。离开“除了看天就是看地”的农村去“闯世界”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小慧^③的说法就很典型，虽然在城市的生活很辛苦，在这个行业里闯荡尤其没有稳定性和保障性，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也过于复杂，但她来说“这都比呆在家里好”，因为“任何事都是两面的”，“干这个能接触到不少人，还能利用一下关系”，最主要的是“趁年轻就一定要出来，如果觉得做得不好还有时间重新再来”。青春对于她来说就是一个试验场，她可以在城市里接触外界，积累经验，摸索什么对自己最好，才决定以后要干什么。对于大部分的女性从业者，干这一行都是暂时的、短期的，并非长久打算，更谈不上“工作”（丁瑜，何式凝，2008）。正如波波所说，她“不想一世种地，做一辈子农民”，她也想“穿漂亮衣服住楼房”，就算“青春饭也要先吃着”，所以她决定“趁年轻出来试试，难道要等到老？”

（三）家庭冲突

有一些女性谈及农村生活的时候提到自己与父母一辈的冲突，实质上是两代人之间因为消费观念不同引起的。小兰的父母在城里打过工，往家里买过一些电器，使她一直很向往更多时髦的用品。她父母建了一栋小房子，她嫌样式“老土”，家具也“过时”，母亲说“有本事你自己做去”，为此她跟家里大吵一架，这也是小兰到城里的原因之一，她想证明给父母看“他们说的也不是很难做到”。小红也提到，自己住的房子破旧、阴暗、潮湿，电灯也不亮，她父母批评她“不知日子艰难”；她想有零花钱，可以去买点吃的玩的，但她父母认为没有必要；她母亲用打工的钱买了手机，过几年她觉得型号太旧了，但母亲说只要能打电话就好。她说她母亲觉得她“从来不知道满足”。事情在她有一次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的一百块钱去买生日礼物给朋友后变得不可收拾，父亲骂她“败家”，她却觉得跟村里“只煮些红鸡蛋”的习惯比起来生日会和互送礼物“很酷很时髦”，“我知道城里的孩子都搞的”。最终她选择了卡通造型的电子手表，“我爸妈一定会觉得太花哨不实用”。她觉得“年轻人肯定有不同的爱好和习惯，父母不能要求我们像他们一样”。她觉得父母的节省并没有让他们家境况变好，因此应该合理花费去改善生活，而非一味节省却什么都没有。小兰认为爸妈是“赚钱攒着”而她是“赚钱就花”。父母一辈认为储蓄重要，花钱要有计划，而攒钱建房子是除了结婚生子外的头等大事，但对于小兰、小红这样的年轻一代来说，消费才是满足情感需要和建立个人风格的途径，“穿得好用得好住得好，这些事不能等我老了才去

^③ 本文中所有提及的访谈对象名字皆为化名。

做”。城市的生活方式也在不同程度上被简单化为消费，当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条件不能满足这种欲望时，出走变成了一种选择。

(四) 贫穷生活下的婚姻

珍姐在19岁的时候嫁给了同村的一个男人，但之后的生活很快打碎了她对婚姻的期待。男方家里很穷，还欠债，一结婚婆家就说分家，结果他们家只分到了一点油和米，还负上了6000多块钱的债。珍姐尝试过养牛、猪、鸡，想改善生活，但收入都用来填债了，一度连几块钱的电费都交不上。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日子更紧巴，但男方家人没有给予任何支持，而丈夫也是“翘着脚什么都不做”。珍姐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能像这样一直过下去”，就在26岁那年她跟一个老乡到了广东，而且一出来“就做这个，15年了都没换过”。她觉得“这么多年来自己为这个家一直付出，但他们眼里只有钱，钱钱钱！他们不讲我的功劳苦劳，感情都没有，就只认钱！”她还评价自己家乡的男人，“十有八九都是这个样子，只要你拿钱回家，他也不管你，他比你还风流快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认为“讲到恋爱啊、感情啊，永远都是女孩子付出得多，还吃亏”，所以自己应该主动些，争取过的舒适一点，看城里“有没有多一点机会，认识多点人，自己也享受一下”。

在笔者的访谈中，已婚女性也多有谈及出来之前的家庭生活，婚姻情感总是一个重要话题，婚恋经历、对婚姻期望和传统性别角色的固着是影响妇女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流动经历又会反作用于妇女的婚姻观念（谭深，1997：44-45）。现代女性摆脱传统性别期待、追求经济独立和自我安全感的欲望和农村生活的贫困相结合，成为了她们流动的一大驱动力。

这些叙述有利于我们从各方面理解流动发生的机理，理解这群女性是在什么境遇下做出流动的选择。而这些欲望的存在与城乡流动、职业选择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这些内心的欲望可能驱动了往城市与性产业的流动，而流动本身的经验与行业体验又进一步深化了作为城市化、现代化主体的欲望。笔者认为，妇女流动与城乡流动应结合起来考察，把城乡阶层差异、性别、年龄维度结合起来整体看待这段经历。

三、城市化表征与女性日常生活

这群女性关于农村生活和流动的叙述都指向了她们对城市化、现代化生活的向往，及建立一种独立自主生活的需要，这个需要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情欲（sexual）、情感（emotional）上的（Rofel，2007）。她们渴望被纳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快速为自己定位，而不是在快速起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或被遗忘、或被利用、或被抛弃。

然而在户口制度下她们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在我国的法制环境中她们更不可能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与认可，她们实现现代化、城市化主体的欲望是通过生活中微小的表达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抓住一些城市生活的表征来重塑自己的性别形象，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正面的感受，因此这些表征物对于她们来说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

笔者从研究中发现的第一套表征物是关于外表和身体的，包括化妆品、潮流杂志、护肤用品、高跟鞋、时尚靓衣等。女性从业者花费在这些物品上的钱占到日常收入的1/3。这些物品不仅帮助她们摆脱“土气”的外表，从表面塑造了都市年轻、靓丽、性感的女性形象（郑天天，2003），更使她们在消费打扮中感到愉快和自信。这种正面感受削弱了流动、歧视带来的负面效应，而通过穿衣打扮她们也找到了城市生活的“切入点”。在竞争激烈的珠三角娱乐行业/性产业中，年轻美貌是赢得收入的必要门票（王政，2003：170）。因此打扮不仅是表面功夫，它与生活态度、待人接物、建立关系、积累资本等一系列活动联系在一起，它仅仅是整个城市生活的开始。

第二套表征物关乎社会网络与信息的建立，包括手机、电脑、网络、电视媒体等，她们籍此

获取更多的信息，建立更广的人际关系网，同时也改变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女性常常谈论手机型号、套餐类型，也会上网看各种新闻以增加聊天的话题。在笔者的一次拜访中，阿娟就问到当时台湾大选的进展和两个党派的情况，她说，“有时候跟客人聊也会讲各种话题的，他们也不喜欢跟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聊天”，所以“外面发生什么事都要知道一点”。她们的手机里有各种客人的联系方式，对于这些重要的社会资源，她们会通过常打电话、发短信问候等方式与其中的一些客人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城市生活中，人脉关系的积累能派上实际用场，阿娟的电脑就是从事IT行业的客人帮忙在电脑城买的，何小姐也在客人的帮助下安装住处的水表。珠三角工厂林立，来自港澳台和全国各地的商人往来频繁，夜总会等消费场所聚集了大量生意信息和人脉资源，因此很多女性把自己打造成“精明女生意人”的形象，穿插于其中，利用这些关系拓展她们的“业务”。阿梅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总是向别人介绍自己为“XX俱乐部业务主任”，她觉得在这种环境中自己锻炼出了一些生意头脑，更重要的是，她觉得她“就是他们生意过程的一部分”，参与感使她感受到优越和“小有成就”。珍姐在刚到广东的时候，和别的女孩一道要忍受妈咪的剥削，但她明白，资源在妈咪手上，因此她一直以礼相待，不骂她还给她一些自己穿不着的衣服。后来那个妈咪说她是“最有礼貌”的一个”不仅送给她录音机，还带她“跑遍了18个地方，连山、东莞、惠州，到处去，那里的路都被我打通了”。

第三套表征物关乎日常生活方式，比如住有物管的小区楼房，在超市购物，去健身房、游泳池，吃麦当劳，上网等等。这些虽然算不上真正的福利，但至少从表面上给予了她们城市生活的方式和品味，因此都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小慧就曾对笔者诉说她关于“上班“和OL（office lady）的想象。她心目中的理想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有冷气，面对电脑，写写画画，跟客户谈谈”，上班对于她来说意味着在高的写字楼内“朝九晚五”，她觉得那“有身份有地位”，“那些白领看起来都很有气质的，生活应该很充实”。若能住在有物业管理的小区，也是一种现代、优越生活方式的表现。笔者认识的几个夜总会女孩子就同租在广州中心城区的大型住宅小区里，一厅三室当年的月租金不包水电要2500多元，但小区是大发展商，有完善的管理与配套。笔者感觉租金较贵，问她们为什么选择那里，她们说“别人听到这个小区都会觉得不错啊”，“有电梯有保安，有24小时的管理处电话，超市就在附近，还有游泳池和会所”。海斌还学会了广东人的煲汤调养，注重健康和营养。从这些小事里我们能感觉到她们把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融入生活的每一方面，通过这些拉近自己与城市的距离。

四、结语

对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女性，到工厂打工是主要的路子，但笔者研究中的女性用她们自己的经历挑战了这个大众化的选择。通过分析她们关于农村生活与贫困，以及城市生活体验的话语，我们能进一步了解她们流动到城市与进入娱乐行业/性产业的决策。分析她们的欲望又能使我们理解她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做法与选择。虽然另辟蹊径也是困难重重，她们仍希望能对城市生活有一种体验与参与。这种参与现代化的方式是另类的，她们赋予发展、现代化、城市化别样的意义，以手边既有的易得的资源为自己建构与前不同的生活。这就是她们想要作为城市化/现代化主体的欲望下的一种选择。在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制约下，能否真正获取身份与社会福利在她们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自我满足感与自我形象的改变才是最直接的收益。这个过程也是这些女性表达自己的性别、阶层、权力理想的过程。在身份政治的分析取径之外，解读欲望和日常生活细节能使我们更清楚的理解这群女性如何定义自主性、城市化与现代化。欲望、梦想、期望有时候显得很抽象，但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语言，它表达的是某个特定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某一群体对某个社会进程的经验。在对于弱势/底层人群的研究中，从身份政治到解读欲望，是理论框架上的一个重要

补充与跨越。

[参考文献]

- [1] 潘绥铭. 存在与荒谬[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2] 潘绥铭. 生存与体验[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3] 潘绥铭等. 小姐: 劳动的权利——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北城市的对照考察[M]. 香港: 大道出版社, 2005.
- [4] 黄盈盈, 潘绥铭. 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J]. 社会学研究, 2003(3).
- [5] 黄盈盈. 小姐的专业化[J]. 2004, <http://www0.hku.hk/sociodep/oralhistory/4/images/art/2-3%20Yingying%20article%202.pdf> (2011年7月13日查阅)
- [6] 张慧霞. 小姐流动的深层原因[J]. 见潘绥铭等. 小姐: 劳动的权利——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北城市的对照考察. 香港: 大道出版社, 2005, 第238-291页.
- [7] 王昕. 流动与健康: 小姐的定性研究与干预模式探索[J]. 见潘绥铭, 黄盈盈主编. 主体与建构: 中国西北地区小姐的世界[M]. 台湾: 万有出版社, 2009, 第1-112页.
- [8] 李若建. 当代中国职业流动研究[J]. 人口研究, 1995(2).
- [9] 李强. 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J]. 社会学研究, 1999(3).
- [10] 孙琼如. 外来农村妇女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泉州市流动人口为例[J].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7(4).
- [11]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01(3).
- [12] 李强. 中国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研究[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0(3).
- [13] 李春玲. 移民与社会流动[J]. 2009a, 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lichunling/grwj_lichunling/P020090508631086713540.pdf (2011年7月14日查阅)
- [14] 任远.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J]. 2010, <http://zgxfz.net/cxfz/wzxs.asp?zzid=5034&wzid=101> (2011年7月13日查阅)
- [15] 潘绥铭. 百年发展: 对于性产业的10大类29种类理论解释[J]. 见潘绥铭等. 小姐: 劳动的权利——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北城市的对照考察[M]. 香港: 大道出版社, 2005, 第292-308页.
- [16] 李银河. 李银河: 应实行卖淫非罪化, 根治对性工作者犯罪[R]. 2005年8月29日搜狐网上专访. <http://text.news.sohu.com/20050829/n226812643.shtml> (2005年10月15日查阅).
- [17] Jacka, T. 2006.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M.E. Sharpe.
- [18] 何春蕤. 自我培力与操演: 与台湾性工作者的对话[J].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001(41).
- [19] Mahler, S. J. and P. R. Pessar. 2001. Gendered Geographies of Power: analyzing gender across transnational spaces. *Identities*, 7(4): 441-459.
- [20] Pun, Ng. 2003. Subsumption or Consumption? The Phantom of Consumer Revolution in 'Globalizing' China. *Cultural Anthropology*, 18(4): 469-492.
- [21] Pun, Ng.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2] 潘毅. 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 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J]. 社会学研究, 1999(5).
- [23] Rofel, L. 2007. *Desiring China*.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4] Rofel, L. 1999.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5] Rofel, L. 2001. Discrepant Modernities and Their Discontents. *Positions*, 9(3): 637-649.
- [26] 李春玲. 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J]. 2009b, http://www.sociology.cass.cn/pws/lichunling/grwj_lichunling/P020090508609725624187.pdf (2011年7月14日查阅)
- [27] 樊士德. 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研究[J]. 南方人口, 2011(3).
- [28] Tsang, A. K. T. and P. S. Y. Ho. 2007. Lost in Translation: Sex and Sexuality in Elite Discourse and Everyday Language. *Sexualities*, 10(5): 623-644.

- [29] 任焰,潘毅.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 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 社会学研究, 2006(4).
- [30] Yan, H. R. 2005. Refusing Success, Refusing 'Voice': The Other Story of Accumul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Global Field Notes. 8. <http://repositories.cdlib.org/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07&context=ucias> (2007年8月9日查阅)
- [31] Ding, Y. and P. S. Y. Ho. 2008. Beyond Sex and Work – An analysis of xiaojies' understandings of work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China. In Jackson, Stevi, Jieyu, Liu and Woo Juhyun. (eds.) East Asian Sexualities: Modernity, gender and new sexual cultures. London: Zed Books. 174–192.
- [32] 谭深.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差异[J]. 社会学研究, 1997(1).
- [33] Zheng, T. T. 2003. Consumption, Body Image, and Rural – Urban Apartheid in Contemporary China. City & Society, 15 (2): 143–163.
- [34] Wang, Z. 2003.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Perry, E. J. and M. Seldo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58–180.
- [35] 郑桂珍,陈月新. 农村流动妇女劳动力的职业变化[J]. 南方人口, 1997(3).
- [36] 余驰,石智雷. 往复式流动还是永久性回流: 农村女性就业流动性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J]. 南方人口, 2011(1).

Another Way of Being Modern-Everyday Lives and Self Practices of Those Female Sex Workers in the Urbanized Pearl River Delta area From the Rural

DING Y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Abstract: Economic factors are often regarded as the key driving force of the rural-to-urban female's migration and their entry into the sex industry. However, abundant narratives can be identified behind the economic poverty of the rural-to-urban female migrants. A field survey of the female sex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South China, demonstrates these female's desires to melt into the urban and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ir strong desire of relocating themselves in China's fas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hind these narratives. However the present law and rules system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barriers prevent them from raising their social status, from winn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upward social mobility on one hand and the social morality stigmatize these rural female migrants engaging in prostitu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us the minor genres of resistances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are used to express their desires, gender identity, self esteem to resist against the gender and class stereotypes.

Key words: "Daigeng Farmers"; Agricult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Regional Diversity; Pearl River Delta